

制度型开放助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与实践^{*}

李 平, 徐丽妮

摘 要: 本文聚焦全球不确定性加剧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高质量发展问题,系统梳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深入剖析单边政策频繁波动、国际投资规则体系碎片化等多重不确定性约束,厘清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现实挑战。在此基础上,以“构建确定性开放制度对冲不确定性外部环境”为核心逻辑,系统阐释制度型开放对冲外部不确定性的内在机理,构建覆盖投资全周期的闭环式风险对冲机制,并依托单边、双边、区域、全球多层级制度型开放实践,提出推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稳健高质量发展的系统性解决方案与配套政策建议。

关键词: 制度型开放; 对外直接投资; 国际投资规则; 全球不确定性

DOI: 10. 11714/jssu. sse. 202605017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全球不确定性持续凸显。政策层面,特朗普政府单边政策调整、关税壁垒升级等带来的政策相机抉择式冲击持续发酵;规则层面,全球数千个双边投资协定导致规则碎片化加剧;实践层面,地缘政治冲突、供应链波动等多重风险交织叠加,显著抬升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决策难度与运营成本,导致投资增速放缓、风险溢价上升,暴露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规则衔接、风险防控等方面的突出矛盾与现实问题。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外部不确定性对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简称 OFDI)的单向冲击效应(López-Duarte & Vidal-Suárez, 2010; 杨永聪和李正辉, 2018; Xiao et al., 2024),或孤立探讨制度型开放的单一维度影响(孙少勤等, 2025; 谢正乾和章一帆, 2025),未能构建起“不确定性约束—制度型开放对冲—OFDI 高质量发展”的系统性分析框架,且在实践路径设计上缺乏对近岸投资协同、全球南方合作等新方式的回应。

制度型开放本质是中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实施的一系列制度调整,其核心在于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秉承因地制宜的原则,搭建一套兼具确定性、一致性与刚性约束力的涉外制度体系,落脚于规则、规制、管理与标准的对内革新和对外接轨。其实践载体包括:国内单边涉外制度创新、双边投资协定升级、区域自贸协定落地、梯度传递式开放、全球南方规则协同等(裴长洪和赵静, 2025; 刘宏等, 2022; 张洪胜等, 2023)。基于制度型开放的概念界定与实践形态,本文将围绕“构建确定性开放制度对冲不确定性外部环境”的核心逻辑展开研究。在理论层面,突破传统要素流动型开放的线性应对逻辑,构建闭环式的对冲机制,系统阐释制度型开放化解政策不确定性、破解规则碎片化、对冲供应链断链风险的内在机理;在实践层面,提出多层级的制度合作框架,依托传递式制度型开放、全球南方协同规则共建等差异化实施模式,搭配产业链集群式合资等微观合作路径,为不确定性约束下中国 OFDI 的稳健发展提供可落地的解决方案。

^{*} 收稿日期: 2026—04—2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制度型开放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机制与对策研究”(25AJY001)

作者简介: 李 平, 上海大学经济学院(上海 200444), 山东理工大学经济学院(淄博 255012);

徐丽妮, 上海大学经济学院(上海 200444)。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定位、格局演进与不确定性约束

(一)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定位

服务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外直接投资是打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链接两种资源的核心枢纽与关键抓手。对内,对外直接投资反向带动国内设备、中间品、技术服务出口,拉动本土上下游配套产业扩容提质,盘活国内存量产能、释放优质供给潜力;对外,依托全球化产业布局深度参与全球资源配置,拓宽国内要素供给渠道,弥补国内关键资源、高端技术供给缺口,打通内外循环堵点。长期来看,大规模高质量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增厚海外资产收益,能够推动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框架实现从“唯 GDP 论”向 GDP 与 GNI 统筹并重、国内产出与海外国民收益协同考量的宏观政策转型,完善兼顾国内生产、跨境经营、国民综合收益的现代化宏观治理体系,夯实双循环格局长期稳定运行的收益基础与产业根基。

推动新质生产力全球化布局。当前全球高技术领域仍由发达经济体主导,中国长期处于价值链相对低位状态。发达经济体集聚高端研发、核心零部件、标准制定等创新资源,仅凭我国国内自主研发难以快速突破技术壁垒、扭转价值链弱势。OFDI 能够帮助企业主动加快全球化布局(王海军等,2023),深度嵌入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全球高端创新体系,通过并购海外科技企业、共建海外研发中心等渠道,高效吸收国际前沿技术、高端制造与先进产业管理经验。海外获取的创新资源反向回流国内,能够带动本土产业链迭代升级,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转型,提升我国高技术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摆脱长期锁定中低端分工的困境,真正实现新质生产力在全球范围的资源整合。

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与韧性。伴随全球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保护主义抬头、大国产业竞争持续升温,仅依托国内生产、单一渠道进口关键物资的发展模式抗风险能力持续弱化。在此背景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逻辑已从早期低成本要素寻求、海外市场拓展的要素驱动模式,全面转向统筹产业安全、技术自主、能源资源保障的中长期战略价值驱动模式。通过重点布局关键矿产、绿色能源、数字经济、高端制造等战略领域,不断增强我国对全球供应链的掌控力。多元化海外产业布局能够对冲单一地区地缘、贸易政策波动带来的供给冲击,分散原材料断供、技术封锁、贸易壁垒等各类外部风险,切实提升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的抗冲击能力与自我修复能力,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稳定运行、国家整体经济安全筑牢坚实基础。

(二)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格局演进与不确定性约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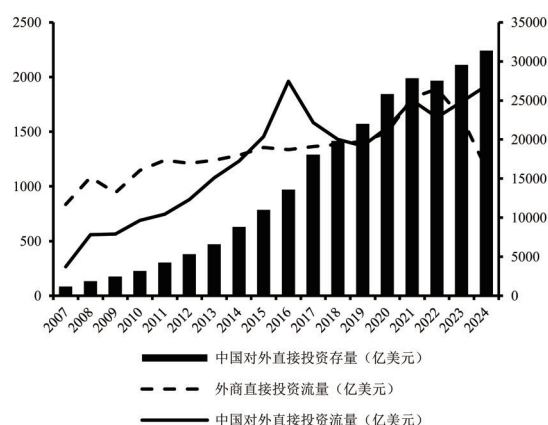
1. 投资流量格局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约束

当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外商直接投资(FDI)流量已发生历史性逆转,“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使得 2014 年 OFDI 流量开始呈现跳跃式攀升,成为中国资本双向流动的新特征。2016 年 OFDI 流量达 1961.5 亿美元,超过同期 FDI 流入,2018 年后则呈现反复波动的情况(见图 1)。这一资本流动格局的演变是国内转型压力与外部不确定性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内部动因看,国内要素成本持续上升、传统产业产能过剩与资源压力,推动企业通过 OFDI 布局全球产业链并拓展海外市场,同时 FDI 流入承压也折射出传统引资优势弱化、高端产业与创新生态对高质量外资的集聚能力尚未完全形成。从外部环境看,2018 年特朗普政府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强化对华投资审查并收紧技术合作等引发的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提高(见图 2),显著抬升了跨境投资的风险预期,既抑制了外商跨境投资(Kim & Lee, 2026),也加剧了全球产业链向“区域化、本土化”收缩,共同导致 2018 年后 OFDI 与 FDI 差额不再单边扩大,而是进入震荡波动阶段。

2. 区域流向特征与规则碎片化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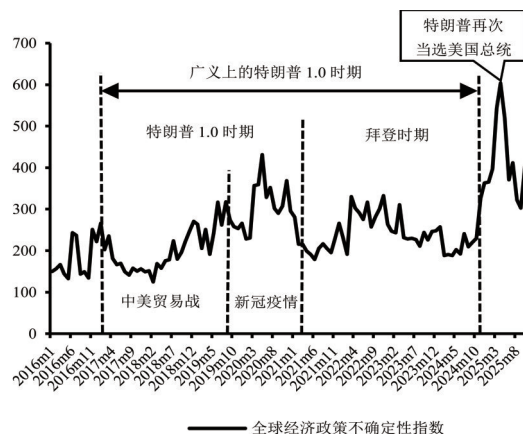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布局呈现以发展中经济体为核心的特征。从存量来看,中国对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存量从 2009 年的 2273.7 亿美元持续攀升至 2024 年的近 28015.9 亿美元^①,远超对发达经济体的投资存量,发展中经济体承接了中国对外投资的主要份额。制度差异可能是其投资流向的重要决

^① 数据来源:《2024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https://www.mofcom.gov.cn/cms_files/filemanager/1077459795/attach/20255/b62b8a78eadd4f92898d27286fd5209b.pdf。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外商直接投资流量情况



数据来源:Global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Index^①。

图2 2016—2025年11月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

定因素(Cezar & Escobar, 2015)。相关研究表明,中国公司在制度薄弱的国家存在竞争优势(Kolstad & Wiig, 2012)。相较于发达经济体企业,中国企业在应对复杂客户关系、非透明营商环境以及处理繁琐法规与不透明政策约束方面经验更为丰富(Yeung & Liu, 2008; Morck et al., 2008),其面临的“外来负担”比其西方同行要小(Child & Rodrigues, 2005; He & Lyles, 2008)。因此,中国在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远超发达经济体,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在制度方面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其制度适配性不足,国际规则衔接不畅。

国际投资协定的碎片化更加提升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合规成本与运营风险,截至2026年3月全球已签署3987(含双边2242)个国际投资协定。《2023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及意向调查报告》显示,企业对外投资最担心监管合规风险(47.8%),且近八成企业在东道国投资及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过合规问题^②。中国企业针对不同协定制定差异化的合规方案,将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熟悉规则条款、调整业务流程、适配认证标准,不仅降低了投资效率,同时推高了投资成本(韩召颖和吕贤, 2021),更使得企业跨境运营的行政负担显著加重,导致部分企业因难以承担高额合规成本,被迫退出部分区域投资市场。

3. 投资方式选择与经贸摩擦壁垒

近年来,在地缘政治冲突升级、全球宏观经济环境剧烈波动的双重驱动下,全球OFDI的方式正发生根本性重构。一方面,美国、欧盟等西方发达经济体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持续加码,导致全球供应链断裂风险显著上升(丁浩员等, 2024),跨国公司全球化布局的核心逻辑已从“效率优先、短期收益最大化”转向“供应链韧性与自主可控优先”。绿地投资凭借其可按照投资者战略规划,在东道国从零构建完全可控的生产体系与研发网络的核心优势,精准契合了跨国公司“安全性优先”的战略诉求。另一方面,部分国家FDI监管法规的频繁调整(Riddiough & Zhang, 2025),叠加美国、欧盟等主要经济体为抑制通胀实施的紧缩性货币政策,推动全球利率中枢持续上行,大幅抬高了以外部融资为核心的跨国并购成本(蒋冠宏和曾靓, 2020),对全球跨国并购市场形成显著的负向冲击。

从中国实践来看,为对冲关税壁垒、转口国反规避调查^③等贸易摩擦对国内市场价格体系(樊海潮等, 2025)、出口贸易规模与结构(余森杰等, 2022)的负面冲击,中国企业通过OFDI布局寻求“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效应(严兵等, 2024),同时叠加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抑制作用(尉亚宁等, 2025),进一步推动中国OFDI呈现“绿地投资主导”的特征。官方数据显示:2021—2024年,中国OFDI

① 数据来源: <https://fred.stlouisfed.org/series/GEPUCURRENT>。

② 数据来源:《2023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及意向调查报告》, http://www.chbeo.org.cn/article_view.aspx?id=5139。

③ 资料来源: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57737763637302636&wfr=spider&for=pc>。

并购金额从318.3亿美元降至256.9亿美元^①;2023年中国对外绿地投资交易数量已超过疫情前(2019年)水平达到81笔,2024年中国对外绿地投资规模延续上年的扩张趋势,投资总额达到323.7亿美元,同比上升17.2%^②。上述格局演进、不确定性约束及其面临的挑战已归纳于表1。

表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格局演进、不确定性约束与现存挑战

格局演进	全球不确定性约束	面临的挑战
1. OFDI流量规模反超FDI 2. 2018年后OFDI与FDI流量规模呈现波动趋势	1. 特朗普1.0时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外部冲击	1. 国内要素成本持续上升 2. 传统产业产能过剩 3. 资源压力 4. 跨境投资风险凸显,收益稳定性不足
1. OFDI区域流向以发展中经济体为核心	1. 国际投资协定的碎片化	1. 与发达经济体制度差距较大 2. 制度适配性不足,国际规则衔接不畅 3. 企业面临巨大合规风险
1. 对外直接投资方式以绿地投资为主	1. 地缘政治冲突升级 2. 特朗普2.0时期关税壁垒升级、转口国反规避调查等贸易摩擦	1. 跨国并购市场形成显著的负向冲击 2. 国内市场价格体系、出口贸易规模与结构面临负面冲击 3. 投资准入壁垒提升,市场进入难度加大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二、制度型开放对冲外部不确定性的理论逻辑

(一)制度约束化解单边政策不确定性

面对特朗普1.0与2.0时期单边经济政策调整、关税壁垒升级、转口国反规避调查等带来的政策相机抉择式不可预期性。通过签署双边与区域高标准自贸协定、投资协定,以创新负面清单准入承诺、国民待遇条款等制度设计,将投资伙伴国的单边政策相机抉择权转化为多边规则下的约束性义务,直接限制缔约方随意加征关税、调整投资准入政策的空间,从根源上消除单边政策突变的不确定性,为企业OFDI提供稳定的长期政策预期。当政策预期实现刚性锁定,企业延迟投资的保守期权价值显著下降,扩张、转换与全球化布局的增长期权价值大幅提升,推动企业从风险规避转向主动的长期跨境布局,缓解跨境投资风险高企、收益稳定性不足的痛点。而稳定的OFDI布局又将进一步打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要素循环,既能通过跨境产能合作向外疏导传统优势产能,也能通过全球要素配置优化采购与生产网络,对冲国内要素成本持续上升的冲击,同时稳定出口贸易的规模与结构,避免单边政策冲击向国内市场价格体系传导。

(二)规则整合破解规则碎片化困境

除了单边政策突变的外生冲击,全球数千个双边投资协定形成的“意大利面碗效应”带来的规则碎片化(裴长洪和刘斌,2020),也是中国OFDI受阻的另一核心制度性约束。制度型开放的核心是从边境开放转向边境后规则开放,主动对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全球高标准经贸规则(李平等,2024),在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国有企业监管等边

① 数据来源:《202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https://www.mofcom.gov.cn/cms_files/filemanager/1077459795/attach/20255/b62b8a78eadd4f92898d27286fd5209b.pdf。

②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绿地投资:从“走出去”到“走进来”,深入本土化运营》, <https://assets.kpmg.com/content/dam/kpmg/cn/pdf/zh/2025/09/chinese-outward-greenfield-investment.pdf>。

境后领域,推动国内规则与国际通行规则的系统性协同,缩小我国与发达经济体的制度差距。制度差异的收窄能够显著降低跨境经营中的信息不对称(He et al., 2022),让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无须面对两套割裂的规则体系,从根源上解决制度适配性不足、国际规则衔接不畅的问题。

在此基础上,制度型开放的实施还能够推动我国从全球投资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转向主动制定者,通过多边与区域自贸协定推动投资规则的一体化整合,构建统一、非歧视、可预期的多边投资框架,减少碎片化协定带来的规则冲突与制度摩擦;而信息不对称的缓解,也让企业无需再为适配不同国家的差异化规则支付额外的合规成本、协调成本,将原本用于应对制度摩擦的资源转化为跨境经营的核心竞争力,系统性化解企业面临的合规风险。同时,通过推动监管互认、标准互认、资格互认等制度性安排,打破发达经济体以制度差异为借口设置的隐性投资壁垒,为我国企业在海外市场获得公平竞争环境提供制度保障(祝继高等, 2023)。

(三)制度创新对冲供应链断链风险

在地缘政治冲突升级、单边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全球价值链与市场准入面临的非预期割裂风险,是中国OFDI面临的另一深层挑战,可通过制度型开放构建制度性绑定的合作网络,形成应对这类不确定性的长效对冲机制。制度型开放并非简单推动供应链多元化布局,而是通过长期投资保护协定、战略产业合作框架与长期供应协议等制度性设计,将关键矿产、绿色能源、数字经济、高端制造等战略领域的合作,从短期的市场化要素交易关系升级为长期的制度绑定关系,让地缘政治驱动的单边断链、脱钩行为直接违反协定约束并面临高额违约成本,从而大幅降低供应链断链的概率,从根本上保障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与韧性。

同时,通过在投资协定中加入自贸试验区施行的市场准入、国民待遇等成熟制度,刚性锁定缔约方的投资准入门槛,明确禁止其随意提升投资壁垒、限制跨国并购、设置歧视性市场准入条件,为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稳定的制度性保障,缓解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市场进入难度加大、跨国并购市场负向冲击等问题。更重要的是,制度型开放中的规则对接能够打破技术跨境流动的制度壁垒,推动我国企业深度嵌入全球创新网络。借助OFDI的反向技术外溢效应,推动国内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枢纽地位与不可替代性(杨连星和罗玉辉, 2017)。

三、不确定性约束下制度型开放推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进路

(一)构建多层次制度型开放合作框架

1. 发挥自贸试验区制度型开放“试验田”作用,打造内外联动的OFDI赋能枢纽

以全国自贸试验区及海南自贸港为核心载体,推动“对内制度创新”与“对外投资赋能”深度融合,为企业出海搭建规则适配、服务集成、风险可控的先行平台。立足试验区“压力测试田”功能开展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探索实践,摒弃直接照搬复制CPTPP、DEPA协定条款的方式,结合我国产业基础、制度国情与监管体系开展差异化试点改造,择取竞争政策、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劳工标准、国有企业监管等关键边境后规则开展小范围、场景化模拟推演与适应性调试。通过本土化改造后的规则试验,让企业在国内可控场景完成国际高标准规则的磨合演练,大幅降低出海后面面对的制度适配成本与合规风险,从前端化解全球规则碎片化带来的经营不确定性。在此基础上,深化境外投资便利化制度改革,在自贸试验区全面推行境外投资“一站式”备案管理,试点企业境外投资外汇收支便利化、跨境融资自由化、境外放款额度优化等创新举措,简化企业跨境投资的审批、汇兑、融资全流程,降低企业OFDI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提升企业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决策效率。

2. 推进“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制度型开放合作,实现从设施联通到规则联通的升级

推动“一带一路”合作从硬基建延伸到软制度建设,针对共建国家制度环境差异化特征,构建适配性

的制度合作体系。核心在于差异化推进双边投资协定(BIT)的续签与升级,针对沿线资源国、制造业枢纽国、通道节点国的不同诉求,补充完善投资准入、利润汇回、征收补偿、政策冻结、争端解决等核心条款,将东道国单边政策调整的空间纳入双边规则约束,对冲政策突变风险。与此同时,还要在沿线重点区域打造制度型开放合作示范区,依托中巴经济走廊、中老铁路沿线、中印尼“两国双园”等平台,试点投资便利化、跨境金融开放、监管协同等制度创新,复制国内成熟的开放经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沿线投资制度模板,为中企集群式出海提供制度缓冲。

3. 强化近岸投资的制度协同,打造近岸产业链投资的规则缓冲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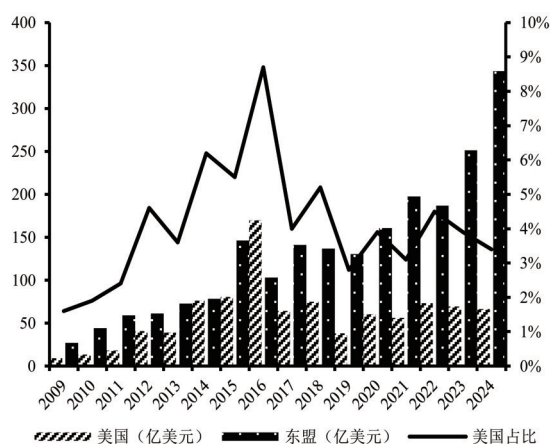
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全面升级,美国加征关税、强化投资审查、限制技术输出等保护主义举措,直接打乱了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原有布局。从图3数据可见,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占比在贸易战后呈现显著下降特征,原本聚焦美国市场的资本因准入壁垒抬升、投资风险陡增而被迫调整流向,大规模向东盟等近岸经济体转移,形成了典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区域替代效应。

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国际投资规则重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持续走高的背景下,这种资本流向的被动重构倒逼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转型,而投资替代也成为对冲外部冲击、稳固对外投资基本盘的破局路径。一方面,需主动与东盟等区域共同建立符合国际高标准的投资制度体系,深化在投资准入、产权保护、市场监管、争端解决等不同领域的规则衔接,推动跨境投资审批流程简化、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构建与东盟高度适配的投资合作规则体系;另一方面,需精准优化对东盟投资结构,摒弃低附加值、同质化的投资布局,聚焦产业链上下游协同配套、高端制造产能转移、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绿色能源合作等关键领域,推动从单一项目投资向产业链集群式投资、从要素驱动向制度驱动转型。通过制度协同与结构优化的双重发力,依托东盟的区位优势与产业基础,打造近岸产业链投资的规则缓冲带,强化与东盟的产业联动与利益深度绑定。

4. 深化RCEP等多边区域投资合作,系统性破解规则碎片化约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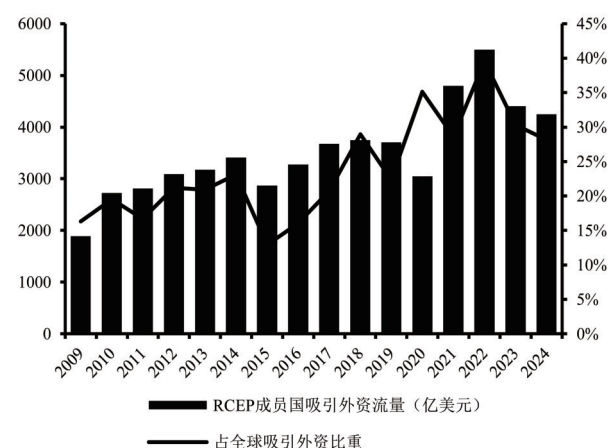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已成为亚太地区投资合作的核心增长极,2009—2024年RCEP区域吸引外资流量整体保持稳步增长态势,2022年区域吸引外资规模突破5400亿美元,占全球吸引外资比重最高达到40%(见图4),已成为全球跨境投资的核心承载区,中国作为RCEP的成员,可借助协定构建的区域投资便利化体系,更顺畅地开拓与获取区域内投资机遇。同时,RCEP的落地生效也能够打破区域内原有各类双边贸易和投资协定交错形成的“意大利面碗效应”(花建和田野,2022),促进区域内投资规则的一体化落地与升级。

推动RCEP投资章节的深度落地,首先要在现有负面清单基础上,牵头开展成员国间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缩减谈判,重点扩大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生产性服务业等领域的投资准入承诺,锁定区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图3 2009—2024年中国对美国、东盟直接投资流量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

图4 2009—2024年RCEP成员国吸引外资情况

域内长期投资开放预期。在此基础上,优化RCEP区域投资争端解决机制,落地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ISDS)机制的区域化方案,建立成员国间投资纠纷快速响应与调解通道,降低企业跨境维权的时间成本与合规成本。进一步来看,还要推动区域内“边境后规则”的协同互认,在知识产权保护、竞争政策、环境劳工标准、数字贸易等领域,建立成员国间统一的行业标准、资质互认与监管协同体系,让企业在区域内投资无须适配多套差异化规则,从根源上解决制度适配性不足的痛点。

(二)创新制度型开放实施模式

1. 实施“传递式”制度型开放,构建梯度化的规则传导与适配路径

传递式制度型开放的核心是打破国际经贸规则“单向对标、照搬复制”的固有范式,破解发达经济体高标准规则与发展中经济体禀赋、国情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构建更具包容性与发展适配性的国际投资治理体系。CPTPP、DEPA等高标准规则根植于发达经济体成熟法治与产业基础,侧重成熟市场权益保障与监管规范,容易忽视发展中经济体工业化转型、基建薄弱、行政体系有待完善的现实痛点。传统发展模式下,发展中经济体被动承接西方高标准规则,往往会因制度适配性不足、发展阶段错位,产生规则落地梗阻、制度摩擦加剧、发展自主权受限等问题(Pinonto'an, 2025)。而传递式制度型开放是在转化吸收高标准经贸规则的过程中形成因地制宜的规章制度,再向发展禀赋、经济发展阶段与自身发展相似的国家中梯度推广,以此夯实双边经贸合作的制度基础,从而帮助广大发展中经济体走上现代化发展道路。

磨憨—磨丁跨境经济合作区可以看作中国“传递式”制度型开放的实践样本。在国内转化吸收环节,中国依托云南自贸试验区昆明片区、昆明经开区、昆明综合保税区与磨憨口岸构建“四区联动”政策叠加体系,先行试点负面清单管理、跨境人民币结算等开放制度,立足自身工业化中后期发展禀赋对国际经贸规则进行本土化改良,主动摒弃CPTPP协定中严苛的跨境数据流动约束、高标准知识产权强保护等超出发展中经济体承载能力的刚性条款。在梯度适配输出阶段,中方并没有向老挝传授西方成熟高标准规则,而是结合老挝基础设施薄弱、行政监管体系尚不完善的发展现实,向外输出轻量化、可分阶段落地的园区制度模块,依据循序渐进的梯度传导逻辑开展规则对接^①。在本土化适配落地层面,老挝磨丁经济特区立足本国产业基础,对中方传授的制度工具进行本土化调整,适度简化外资准入门槛^②,完整保留经中方改良优化的保税加工、跨境智慧通关、多式联运便利化等核心规则,由此形成“中国沿边自贸创新制度—东南亚欠发达经济体”的梯度规则传导链条。

在投资服务领域的具体实践中,中国可撷取自身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一站式外资服务窗口、投资审批制度改革的成熟经验,摒弃西方严苛的准入壁垒与形式化监管要求,为发展中经济体提供适配的外资管理制度方案,帮助东道国在适配自身发展水平的前提下,提升投资便利化水平,实现高标准开放与阶段性发展的动态平衡。在合规与争端治理领域,针对发展中经济体司法体系不完善、应对国际投资争端能力薄弱的短板,中国剥离西方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偏向投资者霸权保护的弊端,重构兼顾东道国公共利益与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纠纷调解、合规治理机制,协助伙伴国家搭建低成本、高效率、本土化的商事争议解决体系,规避西方高标准规则带来的制度适配风险。

2. 倡导并引领“全球南方”制度型开放合作,构建南南投资的互利规则新体系

以金砖国家、上合组织、中非合作论坛、中拉论坛等多边平台为抓手,与“全球南方”国家共商共建适配发展中经济体发展阶段的投资规则,打破发达经济体主导的规则垄断,为央企在南方国家的投资营造稳定的制度环境。围绕资源开发、绿色能源、数字基建、粮食安全等南方国家重点合作领域,牵头制定非

^① 资料来源:《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十年建设:沿边高水平开放的探索与成效》, <https://www.sky.yn.gov.cn/xsyj/zgsd/02820689375269990354>。

^② 资料来源:《老挝磨丁经济特区:滇企“走出去”发展国际产能合作的新模式》, https://www.sohu.com/a/507527094_121119345。

歧视、互利共赢的“区域规则协调机制”(李平等,2026),重点明确投资保护、技术转让、利益共享、本地化发展等核心条款,降低南南投资的制度壁垒。同步全面升级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针对发展中经济体政策稳定性不足、法律体系不完善的特点,在协定中强化政策稳定条款、非歧视性待遇条款与快速争端解决机制,对冲东道国政策突变的不确定性。更关键的是,要推动“规则+能力”双输出的合作模式,不仅要输出适配的投资规则,还要通过技术援助、监管体系建设合作、人才培养等方式,帮助东道国完善投资相关的法律与监管体系,提升东道国的制度治理能力,从根源上降低投资的制度不确定性,同时形成长期互利的制度合作黏性。

(三)创新企业跨境投资微观合作模式

1. 差异化推进与东道国本土企业的合资合作,实现本土化深度利益绑定

针对不同东道国、不同行业的特征,设计梯度化的合资合作方案,将企业投资收益与东道国发展诉求深度绑定,降低政策歧视与地缘干预风险。在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战略敏感领域,优先与东道国国有企业、主权基金开展合资合作,合理设置股权结构,将东道国的民生保障、产业发展、税收就业等目标与项目经营深度绑定,大幅降低国有化、政策歧视等政治风险。在制造业、服务业等市场化程度高的领域,则可与东道国本土龙头企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成立合资公司,借助本土企业的渠道资源、政策理解能力、市场影响力,降低制度适配成本与市场开拓风险,同时通过技术、品牌、管理的协同,形成互利共赢的长期合作关系。此外,还要在合资协议中设置明确的权责划分、利益分配、风险共担与退出机制,配套建立与东道国法律体系适配的公司治理结构,在实现利益绑定的同时,保障中企在合资公司中的合法权益与经营话语权,避免因股权分散导致的经营失控。

2. 拓展与第三国跨国公司的联合投资合作,构建多边利益缓冲带

针对发达经济体设置的投资壁垒、技术封锁与合规风险,主动与欧盟、日韩、新加坡等经济体的跨国公司开展跨境联合投资,通过多边利益绑定分散投资风险。在高端制造、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技术密集型领域,可与第三国跨国公司成立合资研发与投资平台,共同在全球市场开展布局,借助其成熟的全球合规体系、品牌影响力与规则适配能力,降低中企在发达经济体市场的准入壁垒与合规风险,同时通过联合研发打破技术封锁,获取反向技术外溢效应。在发展中经济体市场,则可重点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整合中企的基建能力、成本优势与第三国企业的技术、品牌、全球化运营经验,联合开展重大项目投资,分散单一主体的投资风险,同时通过多边利益绑定,降低地缘政治冲突对项目的冲击。合作过程中,还要建立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长效机制,明确各方的投资比例、权责划分与决策流程,形成稳定的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单一企业的跨境投资风险,转化为多边主体共同分担的系统性风险缓冲。

3. 构建产业链集群式合资合作体系,提升整体抗风险能力

推动国内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联合出海,与东道国本土产业链企业组建产业合资联盟,形成全产业链的利益绑定。在新能源汽车、光伏、电子信息等产业链完整的优势领域,由行业龙头企业牵头,联合上下游配套企业共同在东道国布局,与本土的原材料供应商、渠道商、服务商成立合资合作主体,构建本土化的产业链生态。这种模式既降低了单一企业的投资成本与经营风险,又通过全产业链的利益绑定,提升了东道国对中资产业链的依赖度,大幅降低政策突变、地缘冲突带来的投资限制与断链风险,同时通过集群式布局形成规模效应,提升中企在东道国的市场话语权与议价能力。

四、总结与展望

(一)研究总结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单边保护主义抬头、地缘冲突频发、全球投资规则碎片化加剧,外部不确定性从单一市场波动演变为系统性、制度性全链条风险,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阻碍。传统依托要素成本优势、被动应对外部冲击的开放模式难以适配全新风险格局,亟需从

制度层面构建确定性对冲框架。本文立足这一现实矛盾,围绕“制度型开放对冲外部不确定性、赋能中国OFDI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展开系统分析。

首先,明晰新时代中国OFDI的战略价值定位。突破对外直接投资的传统效益分析框架,将OFDI置于国家发展战略全局中,明确其在服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动新质生产力全球化布局、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韧性三个层面的核心作用:既是联通国内外市场与资源、畅通双循环的核心枢纽,也是嵌入全球创新网络、推动产业向高端跃升、布局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载体,更是分散外部风险、筑牢产业安全底线的重要支撑。三重定位从发展动能到产业升级再到底线保障形成递进逻辑,共同构建新时代中国OFDI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体系。

其次,系统刻画中国OFDI的格局演进特征与外部约束。从投资流量、区域布局、投资方式三个维度全面梳理中国OFDI的演进脉络,发现其呈现出“OFDI与FDI规模历史性逆转后震荡波动、流向集中于发展中经济体、绿地投资占主导”的结构性特征,并进一步厘清与之对应的三类核心外部不确定性:单边政策频繁波动带来的预期不稳定风险、国际投资规则碎片化引发的合规成本高企问题、地缘冲突与贸易摩擦催生的供应链断链压力。三类风险相互交织、层层传导,共同形成了对中国OFDI的全链条冲击,也凸显了传统要素流动型开放模式的应对局限。

再次,构建制度型开放对冲外部不确定性的全周期理论机制。改变传统要素流动型开放被动应对冲击的线性逻辑,以“构建确定性制度对冲不确定性环境”为核心主线,搭建“事前—事中—事后”的闭环对冲框架,阐释制度型开放通过规则约束化解单边政策不确定性、规则整合破解碎片化困境、制度绑定对冲供应链断链风险的内在作用机理,从理论层面揭示制度型开放赋能OFDI的底层逻辑,拓展外部不确定性与跨境投资领域的研究视角。

最后,构建多维协同的OFDI实践推进体系。结合中国OFDI发展现实与核心痛点,从顶层设计到主体落地形成完整路径:一方面搭建覆盖近岸、区域、全球的梯度化制度合作框架,以自贸试验区创新、“一带一路”规则联通、近岸投资协同、RCEP深度落地夯实制度基础,同时通过传递式制度型开放、全球南方规则共建两大差异化模式,打破传统单向对标规则的开放范式,拓展包容性规则共建空间;另一方面推动企业跨境投资模式优化,依托本土化合资绑定、第三方联合投资、产业链集群式合作形成风险缓释能力。制度供给、模式创新与主体实践三者协同联动,形成支撑OFDI高质量发展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二)研究展望

伴随全球经贸格局系统性重构与中国制度型开放的纵深推进,支撑对外直接投资高质量发展的制度设计与实践举措,仍需多维度拓展、深层次优化。第一,动态优化制度型开放的实践路径,完善政策效应的评估与迭代机制。未来需持续跟踪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演变、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最新动态,重点关注主要经济体政策转向、高标准经贸协定扩容、区域投资格局调整等新趋势,动态适配制度型开放的实施策略。对内,需持续深化自贸试验区、海南自贸港的制度创新试验,进一步推进边境后规则的压力测试与本土化适配,深化境外投资备案、跨境外汇收支、跨境融资等领域的便利化改革;同时建立制度创新对OFDI赋能效应的量化评估机制,及时总结可复制推广的经验,提升制度供给的精准性与有效性。对外,需分类推进双边与区域投资协定的升级谈判,针对发达经济体聚焦规则对接、争端解决机制完善,针对发展中经济体侧重规则适配、能力建设协同,持续夯实近岸、区域、全球的梯度化制度合作网络,提升中国OFDI全球布局的制度保障能力。

第二,构建分类型差异化的制度型开放工具体系,提升制度供给精准性。当前制度型开放实践多以整体性、普惠性规则推进为主,对不同投资动机、不同区域、不同行业OFDI的差异化需求适配不足。未来可基于中国OFDI的结构特征,搭建分层分类的精准制度供给体系:针对技术寻求型OFDI,重点强化与发达经济体在知识产权保护、竞争政策、技术流动规则上的对接,降低高端技术领域的投资准入壁垒;资源保障型OFDI,深化与资源国的长期投资保护协定、供应链绑定机制建设,对冲地缘波动带来的断链风险;市场拓展型OFDI,依托近岸与区域自贸协定推动投资便利化、监管互认落地,降低跨境经营合规成

本。同时针对不同发展水平的东道国群体,匹配差异化的开放模式,精准提升制度工具的风险对冲效能。

第三,健全企业跨境投资全生命周期赋能体系,强化中小企业出海的制度支撑。未来可进一步延伸制度型开放的赋能边界,构建覆盖投资决策、项目落地、运营管理、风险处置全周期的海外投资服务支撑体系。一方面,依托公共服务平台整合国别合规指引、风险预警、法律援助、争端调解等服务资源,重点破解中小企业出海面临的合规能力不足、信息不对称等痛点,降低企业跨境经营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完善跨境投融资支持体系,结合自贸试验区金融开放创新,拓宽企业跨境融资渠道,优化境外投资担保等风险分担机制,为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开展战略领域投资提供长期稳定的金融支持。此外,进一步引导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出海,构建龙头企业引领、大中小企业配套的集群式出海生态,提升中国企业海外布局的整体抗风险能力与市场竞争力。

第四,深化全球南方投资规则共建,推动中国在全球投资治理中的角色升级。当前全球投资治理体系正处于深度重构期,发达经济体主导的传统规则体系难以适配广大发展中经济体的发展诉求,全球投资治理的包容性不足问题凸显。未来可依托金砖国家、上合组织、中非合作论坛、中拉论坛等多边合作平台,持续深化与“全球南方”国家的投资规则共商共建,推动建立兼顾发展权益与投资保护、更加公平包容的南南投资规则体系,打破传统规则的垄断格局。同时,积极推动传递式制度型开放的实践落地,将中国在投资便利化、营商环境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领域的成熟经验转化为国际公共产品,通过技术援助、人才培养、监管能力建设等方式,帮助发展中经济体完善投资治理体系,实现规则共建与能力提升的协同推进。在此基础上,主动参与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多边框架下的全球投资治理改革,推动多边投资便利化协定全面落地,提升中国在国际投资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为中国 OFDI 的长期稳健发展营造更加稳定、可预期的全球制度环境,也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提供制度支撑。

[参 考 文 献]

- 丁浩员,董文娟,余心玳. 贸易政策冲击下的跨国供应链断裂与重构研究. 经济研究,2024(8):95—113.
- 樊海潮,吴彩云,戴冕. 关税波动对国内市场价格的影响. 管理世界,2025(4):56—75.
- 韩召颖,吕贤. 全球经济治理创新:一项基于议题调适和规则重构的分析.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1(1):80—99.
- 花建,田野. RCEP与中国提升对外文化贸易竞争力.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38—49.
- 蒋冠宏,曾靓. 融资约束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跨国并购还是绿地投资. 财贸经济,2020(2):132—145.
- 李平,贾松,徐丽妮. 不确定性与全球南方制度型开放. 战略决策研究,2026(2):26—41+125—126.
- 李平,杨雪,史亚茹.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下制度型开放的逻辑阐释与发展路径. 南开经济研究,2024(6):3—20.
- 刘宏,冯骞,赵恒园. 外资安全审查加剧背景下中国 OFDI 面临的挑战及对策——以日本规避美国投资壁垒的经验为借鉴. 国际贸易,2022(8):70—78.
- 裴长洪,刘斌. 中国开放型经济学:构建阐释中国开放成就的经济理论. 中国社会科学,2020(2):46—69+205.
- 裴长洪,赵静. 在扩大制度型开放中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国际贸易问题,2025(1):1—18.
- 孙少勤,张家霖,周禹言. 制度型开放对我国 OFDI 水平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自贸区设立的准自然实验.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3):94—103+155.
- 王海军,杨虎,李丰雅,等. 对外援助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吗?——基于国家风险视角. 南开经济研究,2023(1):21—42.
- 尉亚宁,鲍晓华,邓建鹏. 贸易保护主义抑制中国企业跨国并购. 经济学(季刊),2025(6):1544—1560.
- 谢正乾,章一帆. 制度型开放与企业“走出去”:来自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的证据. 世界经济研究,2025(9):75—89+136.
- 严兵,吴琦琦,王乃合. 反倾销、贸易联系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中国工业经济,2024(5):60—78.
- 杨连星,罗玉辉.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全球价值链升级.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7(6):54—70.
- 杨永聪,李正辉.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驱动了中国 OFDI 的增长吗——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 GMM 估计. 国际贸易问题,2018(3):138—148.
- 余森杰,田巍,郑纯如. 中美贸易摩擦的中方反制关税作用研究. 经济学(季刊),2022(6):2041—2062.
- 张洪胜,谢月星,杨高举. 制度型开放与消费者福利增进——来自跨境电商综试区的证据. 经济研究,2023(8):155—173.

- 祝继高,梁晓琴,曲馨怡. 标准互联互通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对外投资风险视角. *财经研究*,2023(9):138—153.
- Cezar, R., & Escobar, O. R. Institutional Distanc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2015, 151(4):713-733.
- Child, J., & Rodrigues, S. B.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Firms: A Case for Theoretical Extension.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005, 1(3):381-410.
- He, L., Huang, L., & Fang, L. Institutional Conditions,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an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ment in China. *Emerging Markets Review*, 2022, 50:100823.
- He, W., & Lyles, M. A.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Business Horizons*, 2008, 51(6):485-491.
- Kim, D., & Lee, S. Multinational Investment Activity Under Policy Uncertainty in Host and Compet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26, 161:104252.
- Kolstad, I., & Wiig, A. What Determines Chinese Outward FDI?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12, 47(1):26-34.
- López-Duarte, C., & Vidal-Suárez, M. M. External Uncertainty and Entry Mode Choice: Cultural Distance, Political Risk And Language Diversity.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0, 19(6):575-588.
- Morck, R., Yeung, B., & Zhao, M. Perspectives on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8, 39(3):337-350.
- Pinonto'an, N. D. S. Navigating the Drivers, Challenges, and Required Institutional Reforms for Indonesia Accession to the CPTPP. *Jurnal Hubungan Luar Negeri*, 2025, 10(1).
- Riddiough, S. J., & Zhang, H. Cross-border M&A Flows, Economic Growth, and Foreign Exchange Rates.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25:hhaf109.
- Xiao, L., Zhao, L., & Zhu, Q. Host Country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Trade Openness and Chinese Enterprise Overseas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 2024, 96:103566.
- Yeung, H. W., & Liu, W. Globalizing China: The Rise of Mainland Firms in The Global Economy.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2008, 49(1):57-86.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stitutionalized Opening-Up in Supporting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i Ping, Xu Lini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 amid rising global uncertainty. It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current state of China's OFDI and conduct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multiple constraints stemming from uncertainties, such as frequent fluctuations in unilateral policies and the fragment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rules regime, so as to clarify the practical challenges confronting China's OFDI. On this basis, guided by the core logic of “establishing a framework of certainty to hedge against an uncertain external environmen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lucidates the intrinsic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institutional opening-up hedges against external uncertainties. It constructs a closed-loop risk-hedging mechanism covering the entire investment lifecycle. Drawing on multilevel practices of institutional opening-up at unilateral, bilateral, regional and global level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ystematic solutions and support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foster the steady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OFDI.

Keywords: institutional opening-up;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rules; global uncertainty

【责任编辑:周吉梅;责任校对:周吉梅,赵洪艳】